

# 《了凡四训》研究综述

邓琦<sup>1</sup>

(曲阜师范大学 孔子文化研究院, 山东 曲阜 273100)

**【摘要】:**《了凡四训》是明清之际极为重要的一部善书。近二十年来,学界对其所蕴含的三教融合思想、立命观念、道德修养论、劝善思想等内容进行了分析研究,成果丰硕。现就2001-2021年间的研究文献作一综述,以探索其研究发展变化的轨迹与多元面貌,总结研究成就。

**【关键词】:**袁黄 《了凡四训》 综述

**【中图分类号】:**B8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079(2022)02-0019-07

袁黄(1533-1606),字坤仪,号了凡,浙江嘉善人,是晚明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其代表作《了凡四训》是一本流通领域广泛的民间劝善书,深受民众的欢迎与喜爱,民间多将之视为修身立命的指导书。1994年,袁啸波指出善书因被视为封建迷信读物而被禁止出版与流通,导致善书研究领域在国内很少有人涉足,学界应该重新审视此类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sup>[1]</sup>实际上自改革开放后,学界逐渐开始重视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批判与继承,加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酒井忠夫<sup>1</sup>、美国学者包筠雅<sup>2</sup>、中国香港学者游子安<sup>3</sup>等对劝善书展开了专题研究,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使得专家学者们纷纷开始重视这一研究领域。而《了凡四训》作为善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自然掀起了一番研究热潮。2001-2021年间,以国内学界较为权威的“中国知网”为检索工具,以“《了凡四训》”为关键词,检索发现相关研究文献已近150篇。学者们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掘新史料,使得研究侧重点不断多样化,本文将对其进行梳理分析与综述,并对《了凡四训》的相关研究趋势作一探讨。

## 一、关于《了凡四训》宗教思想的研究

袁黄所著的《了凡四训》作为修身立命、教子齐家的范本曾被大量刊刻,在海内外广泛传播流行,极具社会影响力。《了凡四训》涉及诸多宗教领域内容,兼具儒释道三家思想,书中的因果报应论、修行方法论、解脱论等均是佛教思想的重要主张。故而,很多学者将研究视角放在《了凡四训》的宗教性研究上,其中不乏硕士学位论文。

### (一)关于《了凡四训》中佛教思想的研究

《了凡四训》成书于佛教发展活跃的晚明时期,佛教思想十分浓厚,主张因果报应论,认为人所犯下的罪恶和过错可在佛前忏悔以进行自新与更改,并秉持乐善好施、慈悲为怀的信念,还倡导修习功过格与准提咒等等。目前,学界关于《了凡四训》中佛教思想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围绕其中所倡导的“因果报应论”展开研究;二是立足整体,从佛教思想与《了凡四训》的关系的角度对《了凡四训》进行整体的把握。

袁黄在《了凡四训》中列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证明“因果循环,报应不爽”这一理论,以此来劝诫百姓从善积德,而“因果报应论”又是佛教的重要思想主张。谢一批指出,袁黄的《了凡四训》是紧密围绕佛家的因果学说展开的,并分析了因果学说在其中的具体表现,为进一步探讨书中的安身立命之道作了重要铺垫。<sup>[2]</sup>何孝荣指出,袁黄因长期与各类僧人交游而深受佛家“即心

---

**作者简介:**邓琦(1995-),女,四川绵阳人,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儒家文献整理研究。

即佛”理念以及因果报应说的影响，继而讨论了袁黄对佛教思想的践行、对佛教的维护以及其为佛教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等内容，为进一步认识袁黄与佛教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参考。<sup>[3]</sup>任宜敏认为，《了凡四训》是袁黄将佛教思想中的因果报应论与自身转变命运的实际经历和感悟相结合而撰成的书籍，书中的佛理深妙绝伦，是为肺腑之言。<sup>[4]</sup>此外，赵霞和牟永生<sup>[5]</sup>、张丹<sup>[6]</sup>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许健和宋浩研究的切入点虽各不相同，但殊途同归，均从整体上对《了凡四训》中的佛教思想进行了分析研究。<sup>[7,8]</sup>许健主要围绕《了凡四训》的成书背景、书中佛教思想的主要内容、书中佛教思想的社会意义等方面展开，将《了凡四训》中的佛教思想进行了分类(如因果报应论、伦理道德论、佛教修行方法论、佛教命运观等方面)与阐述，进而分析出《了凡四训》中佛教思想的特点以及书中佛教思想的社会意义。这为探究社会环境对宗教的影响以及宗教在相同社会环境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存在的意义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意见。宋浩则直接探讨了《了凡四训》中的因果报应论、佛教心性论、佛教修行解脱论及《了凡四训》对今人的启示，并认为前三个部分对于如今道德观的树立、行为的规范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认为袁黄在佛教理论的基础上汲取了儒、道中的理论从而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二者的研究各有特点，虽说内容上存在着一些相似、重复之处，但都对《了凡四训》中涉及佛教的主要思想内容有较为全面的总结与把握。

## (二)关于《了凡四训》中道教思想的研究

袁黄在《了凡四训》中也融摄了道家的思想主张，只不过相较于佛教思想，道家的思想主张在《了凡四训》中表现得没那么突出，但也深具特点。

林志鹏重点研究了袁黄与道教的渊源、袁黄与道家养生论、袁黄对道教法门的日常修持等方面内容，认为相对于晚明三教融合的思想背景，袁黄与道教的渊源及道家思想对袁黄的影响是晚明三教融合风气下的个体反映，袁黄的儒家本位立场表明了晚明儒者对道教思想持有的是开放与兼容的心态。<sup>[9]</sup>张丹指出，《了凡四训》充分体现了道家思想精髓，处处充满着道家所主张的人生观与世界观。譬如，有关“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立命主张高度契合了道家所主张的“无为”思想，并解释道，道家所倡导的无为并非虚度时光、无所作为，而是要通过加强自身修养、提高品行来改变世界，这无疑能与袁黄的主张产生共鸣。<sup>[10]</sup>袁黄对自身命运的改变，流露出一种参透生命的感悟，在无形之间达到了生活、做人之最高境界，在伦理价值上十分具有超越性。

## (三)关于《了凡四训》中的三教融合论的研究

晚明时期，三教融合思潮达到顶峰，甚至在后阳明时代，阳明后学也援宗教入儒学，此时的学术思想具有很强的宗教倾向。而诞生于这个时代的《了凡四训》最大的特色也就是融摄三教思想。杜梅指出，晚明的功过格思想是由儒释道三家积淀而来，功过格修养法充分体现了儒释道的三教合一性，而袁黄的《了凡四训》又是功过格理论的思想源泉，兼具儒释道三家之要旨。<sup>[11]</sup>曾礼军认为，明代三教融合的社会风气深刻地影响了袁黄的观念，《了凡四训》虽然是一部以劝善积德为主的诫子类家训著作，但书中很多有关劝善的原理、实践方法以及道德评价方式都深受宗教影响，并对书中涉及的三教思想分别进行了分析讨论。<sup>[12]</sup>赵建永分析到，袁黄在《了凡四训》中构建起来的劝善体系是明代儒释道三家思想长期融合的重要表现，结合了袁黄对自身命运的探索与体悟，诸多观念表明袁黄已达到汇通三教的新境界。<sup>[13]</sup>此外，谭荣也认为《了凡四训》中的伦理思想具有儒释道三家思想相融合的特点，并分别讨论了这三家思想在《了凡四训》中的体现。<sup>[14]</sup>

# 二、关于《了凡四训》伦理思想的研究

伦理思想是《了凡四训》思想主张中的重大特色，《了凡四训》中的家训、家风教育，积德行善观念以及道德主义理论都是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而成为很多专家学者研究的重要议题。

## (一)关于《了凡四训》家风、教育的研究

《了凡四训》也是一部诫子类家训，袁黄为教育儿子袁俨认识命运真理、明辨善恶、行善积德，便现身说法，以自己亲身经历说明积极进取能够改变命运，即“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道理，总体来看，《了凡四训》是一部具有劝善书性质的家训著作。姚立军、费晓燕认为袁黄深受家族教育影响，在延续家族传统和结合自身探索实践的基础上写成了广泛传布的诫子类家训《了凡四训》。<sup>[15]</sup>陈延斌表明，《了凡四训》是袁黄的家训教化思想的重要载体，其“立命”“改过”“积善”“谦德”等主张是袁黄修身处世之道的重要体现，在中国家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还采用分析文本的方法简论了《了凡四训》中的主要伦理思想，分析了其现代价值，认为《了凡四训》中所蕴含的家庭伦理精华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家风家教建设、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均有重大意义。<sup>[16,17]</sup>王宇翔从《了凡四训》家教家风思想的产生、主要内容和特点、家教家风思想评析及时代价值与实践等方面展开论述，认为《了凡四训》是优秀的传统家教家风著作，在道德修养、为人处世、人生抉择等方面均有较高的指导价值。<sup>[18]</sup>

此外，曾海、郝忠勇、钟岳文均分析讨论了《了凡四训》中所蕴含的人生智慧与宝贵经验，认为书中有关为人处世的原则与方法、对德育及言传身教的重视以及现身说法的教育方式均极具启发意义，有重大学习价值。<sup>[19,20,21]</sup>

## (二)关于《了凡四训》劝善、改过思想的研究

劝人为善不仅是袁黄所在的嘉善袁氏家族的传统，更是袁黄较出彩的思想主张，在《了凡四训》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主要表现为“劝善”与“改过”两个方面。

袁黄笃信佛家所倡导的“因果报应说”，故而其坚信积德行善能带来福报，再加之在长期的积德行善后袁黄确实也获得了自己所期许的福报，并认为有过错不用担心，只要及时“知非”且“改过”，并长期坚持行善便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改变命运。肖群忠指出，《了凡四训》是一部反响巨大的善书，并讨论了书中“福善祸淫、因果报应”的民间人生伦理信念、“奉行诸善”的民间善良意识、“改过”“谦德”等道德实践以及这些伦理思想对后世的启示等内容，认为《了凡四训》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民间伦理思想的典型，对民众的人生与道德实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sup>[22]</sup>汪学群主要从“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立命论、迁善改过的方法与途径、谦德的功效以及这些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展开讨论，指出《了凡四训》是以劝善为主题来展开叙述的，袁黄充分认识到了“命”与“运”之间的变数转化关系，为了给自己造一个好命就必须积德行善，从而获得福报。<sup>[23]</sup>张琦芳谈到，虽然《了凡四训》中融合了三教思想，但其中的善恶观念却明显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对儒家德善观念的继承与发扬。还讨论了《了凡四训》中的劝善思想以及其中儒家思想的渊源。<sup>[24]</sup>任俊华认为，《了凡四训》鼓励人行善，十分重视“善”的价值及其对个人、家庭的重要意义，且深刻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躬行性”“向善性”三大特点。<sup>[25]</sup>

也有学者从慈善思想的角度来解析袁黄在《了凡四训》中的劝善思想。马丽以袁黄及其《了凡四训》为切入点，分析、考察了明清社会转型时期善书在江南地区的形成与发展，及劝善思想对后世民间慈善组织所产生的影响。<sup>[26]</sup>王卫平、马丽考述了袁黄劝善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认为其不仅受到家学的影响，还受到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sup>[27]</sup>程伟指出《了凡四训》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思想，作为劝善书的《了凡四训》深刻阐述了“命由我作”的道理，认为《了凡四训》是一本能够指导人们修身处世的重要书籍，其中的慈善思想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与借鉴魅力。<sup>[28]</sup>

“改过”是袁黄进行道德实践的重要方式。张丹讨论了《了凡四训》对人生“善”与“过”的看法，以及袁黄是怎么教会人们去积德行善与改过的。<sup>[29]</sup>刘坤分析了《了凡四训》中的改过伦理思想，认为改过者在改过时要先具备袁黄所要求的羞耻心、畏惧心和勇敢心，才能通过“理、事、心”三条改过之法对所犯错误进行更正，还总结了袁黄所主张的“训过”伦理思想对今世社会的重要启示。<sup>[30]</sup>潘志宏认为改过思想是《了凡四训》中的核心主旨，不仅讨论了为什么需要改过、袁黄在改过过程中的心态，还阐述了袁黄改过的层次与效验，并认为袁黄的改过思想于现今仍然适用。<sup>[31]</sup>黄莹分析了自省观在《了凡四训》中的体现，继而讨论了其中“心”“自省”与立命观之间的关系，认为袁黄在为善上的实践活动实际上是在践行自我省检。<sup>[32]</sup>吴文新认为，要想亲近与践行符合生态文明价值观的绿色生活方式，可充分学习《了凡四训》中改过的方法，重视袁黄改过之法中的“发三心”，以助力绿色生活方式的践行。<sup>[33]</sup>

### (三)关于《了凡四训》“修德”与“立命”思想的研究

#### 1. 关于《了凡四训》中“修德”思想的研究

孙占同通过挖掘与归纳《了凡四训》中的伦理思想,认为其成书于政治混乱、社会风气恶化的晚明社会,当时士人救世的方式便是进行道德思考,“道德”问题在晚明社会各阶层都备受重视,而《了凡四训》中的伦理思想与道德教化方式独树一帜,书中有关“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信念、对功过格的奉行、对“公心、诚心、爱敬之心”的要求、对行善的要求等伦理思想的世俗性,本质上体现了道德哲学的世俗化,是由纯粹道德转向世俗道德的体现。<sup>[34]</sup>韩丽华介绍了《了凡四训》的四个主旨,指出书中包含很多劝人积德行善的方法与主张,建议今人学习其“修身立德”的方法,以提高道德修养境界。<sup>[35]</sup>徐立志指出《了凡四训》规劝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行善积德以改变命运,书中很多思想与方法如改造命运、甄别是非、戒除骄躁等,对于提高道德修养、加强道德建设都具有重大启示。<sup>[36]</sup>鲁克成、宋卫指出,《了凡四训》中的修善积德、改过、谦虚等思想主张对于当今大学生的自我道德培养与塑造具有重大意义,作者重视其价值理念,并倡导推广《了凡四训》。<sup>[37]</sup>李秧考察了《了凡四训》中德福观的渊源及主要含义,通过分析书中德福观的伦理要求及其价值,认为其中所蕴含的道德与福报相一致的思想,提升了“德”对人生的影响,堪称道德培养之书。<sup>[38]</sup>丁洋洋对《了凡四训》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讨论,认为《了凡四训》对于道德传承和道德教育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了凡四训》的大行于世,使得家庭基础道德教育得到了重视。<sup>[39, 40]</sup>

#### 2. 关于《了凡四训》中“立命”思想的研究

姚蓓、桑明旭指出,儒、佛两教思想是《了凡四训》“立命”观的思想基石,此观重视因果报应、端正态度,指导人们努力积极进取、积德行善以改变命运,且此对良好社会风气的树立以及个人道德的培育具有积极意义。<sup>[41]</sup>张世琼认为《了凡四训》的核心理念是“立命”,而“积善”“改过”等道德实践又是实现“立命”的具体途径,所谓“立命”实际上是将“德”与“命”建立联系,将人的生死祸福都与道德相关联,并认为袁黄所主张的道德观念是有宗教基础的。<sup>[42]</sup>谷雨也主要从“立命”“改过”“积善”等方面来讲述《了凡四训》对人转变命运的指导,认为无论是积善、改过还是谦德都应该以立命为基础,充分认识生命生活的本身所在。<sup>[43]</sup>张丹阐述了袁黄受云谷禅师点化的具体过程,探讨了《了凡四训》中的“立命观”与民间劝善思想之间的关系,认为袁黄所倡导的“改命”与“积善”的方法深受百姓推崇。<sup>[44]</sup>姚晶晶指出,《了凡四训》认为命运可改且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改过、积善与谦德则是改命的重要方式,认为《了凡四训》中的命运观具有积极意义。<sup>[45]</sup>

此外,胡超、李艳霞、韩星等的文章<sup>[46, 47, 48]</sup>也涉及过“立命”思想的研究。

## 三、关于《了凡四训》其他思想的研究

宗教思想、伦理思想历来是研究《了凡四训》的专家学者们青睐的选题方向,但是对《了凡四训》的研究也不乏独辟蹊径者。

#### (一)关于《了凡四训》思想价值的研究

有关《了凡四训》思想价值的研究是除宗教、伦理思想研究外最多的选题。李一分析了《了凡四训》的文本内容,认为其蕴含了多方面的有益文化,但也存在着主张过于功利、有些脱离社会实际等问题,应在传承与发扬优秀家训文化的同时重视对所传承内容的价值辨识。<sup>[49]</sup>赵佳分析道,袁黄在教育儿子的过程中所得出的思想感悟主要源于“立命观”“善恶观”及“迁善改过”等主张的实例,具有极高的德育价值,讨论与学习其中的德育思想对于我国的德育工作有较大助益。<sup>[50]</sup>李学昌认为,《了凡四训》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与教化作用向来被视为家训名篇、德育典范,其通过“四训”主张表达出了积极的人生观念,对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积极的人生观有重要意义。<sup>[51]</sup>孙阳发现,《了凡四训》虽然属于道德教育类书籍,但也包含了道德回归生命之意,其“命由我作”的基本生命观与对生命价值的阐释都十分值得高职院校生命教育借鉴与学习。<sup>[52]</sup>

## (二)其他相关研究

吴文新、朱康有以袁黄的道德修养为切入点,将其与共产党的党性修养相结合来论述新时代共产党人的信仰自觉,以特定新角度展开梳理论,使得研究极具现实意义。<sup>[53]</sup>李霞指出,袁黄所处的时代正是明朝社会大变动时期,《了凡四训》中尤其是在“积善”篇中所举的例子都是真实的,所以更具有劝服力,也能由此分析出当时江南的社会状况。<sup>[54]</sup>王成涵谈到,《了凡四训》所主张的立命观及其所推崇的劝善改过思想呈现出了浓厚的积极心理学思想色彩,与积极心理学所倡导的培养、激发人的优秀心理品质与性格特征极为相似。<sup>[55]</sup>钱翰发现,袁黄在《了凡四训》中所使用的叙事型而非教条型的人生道德教育方式更能够深入人心,因而具备了强大的教化功能。<sup>[56]</sup>李丽发现,《了凡四训》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极具独特性,作为家训,更有其独特的家训文学价值,具体则表现在其书具有先进性、科学性、通俗性、趣味性等特点上。<sup>[57]</sup>曲静敏认为,《了凡四训》中的诸多观点能对幼儿三观的树立起到显著的提升效果,能够帮助幼儿创建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思维方式,引导幼儿逐步认清为人处世的道理。<sup>[58]</sup>郑姗姗、谢谦分析了《了凡四训》中的宗教思想和立命观念,并由此发现晚明时期的精英儒家思想的发展开始倾向于世俗化和功利化,这也是晚明时期社会通俗文化和正统儒家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冲突的重大表现。<sup>[59]</sup>

综上所述,近二十年学界关于《了凡四训》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也呈现出一些很鲜明的特点。首先,从研究成果公开发表的形式来看,期刊类论文仍为主要发表形式,硕士学位论文次之,杂志、报纸再次之;其次,对《了凡四训》主要的研究成果还是只集中在对其中宗教思想、伦理思想的研究上,但研究角度不断地丰富,除了以宗教、伦理两方面为切入点外,学者们还别出心裁地从其他小方向展开研究,诸如心理健康教育、文化文学等;再次,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逐年不断地深入与扩宽,比较突出的是硕士毕业论文数量增多,且主要集中在近五年。但仍存在一些不足,还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第一,当前的研究成果中缺乏研究专著,大多数研究只是将其视为重要举例对象;第二,当前诸多研究存在选题扎堆、撞题的情况,导致很多研究成果在研究内容上存在着大量相似、重合之处;第三,总体来看,目前的研究成果选题方向比较集中,缺乏新意,且研究方式较为单一,缺乏比较研究。虽然当前《了凡四训》的相关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但研究成果与学术成就却是今后进行新研究的基石。

### 参考文献:

- [1]袁啸波.民间劝善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0-11.
- [2]谢一珮.佛家因果学说与安身立命之道——读《了凡四训》解[J].新西部(伦理版),2013(11):92,98.
- [3]何孝荣.论袁黄与佛教[J].史学集刊,2017(4):4-14.
- [4]任宜敏.袁了凡佛学思想析论[J].人文杂志,2007(4):27-32.
- [5]赵霞,牟永生.《了凡四训》中的因果观及其当代意义[J].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7,33(1):102-105.
- [6]张丹.《了凡四训》与佛教的解脱理论[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1):132-133.
- [7]许健.《了凡四训》中的佛教思想研究[D].兰州:西北民族大学,2018.
- [8]宋浩.《了凡四训》中的佛教思想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7.
- [9]林志鹏.袁了凡与道家道教[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74-86.
- [10]张丹.《了凡四训》与道家的超越性[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3):90-91.

- 
- [11]杜梅. 晚明功过格修养法的三教合一性[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8, 29(2):124-129.
- [12]曾礼军. 简论袁黄《了凡四训》劝善思想的宗教影响[J]. 嘉兴学院学报, 2012, 24(4):5-8.
- [13]赵建永. 《了凡四训》融会儒释道的善学思想[J]. 中国宗教, 2021(5):68-69.
- [14]谭荣. 《了凡四训》伦理思想研究[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4.
- [15]姚立军, 费晓燕. 袁了凡的家风教育及其时代价值[N]. 人民政协报. 2018-11-14(011).
- [16]陈延斌. 论袁黄的家训教化与功过格修养法[J]. 武陵学刊, 2016, 41(5):1-6.
- [17]陈延斌, 张琳. 简论《了凡四训》的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 船山学刊, 2017(2):98-102.
- [18]王宇翔. 《了凡四训》家教家风思想的当代价值[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8.
- [19]曾海. 家风建设视域下《了凡四训》及其对新时代大学生的意义[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8, 35(11):41-45.
- [20]郝忠勇. 读《了凡四训》说惩戒[J]. 教育, 2015(5):74.
- [21]钟岳文. 《了凡四训》:袁了凡的诫子家训[J]. 月读, 2019(5):43-51.
- [22]肖群忠. 《了凡四训》的民间伦理思想研究[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1):19-23.
- [23]汪学群. 《了凡四训》伦理思想发凡[J]. 道德与文明, 2016(4):5-9.
- [24]张琦芳. 《了凡四训》善恶观中的儒家思想[J].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2018, 27(2):105-108.
- [25]任俊华. 《了凡四训》的向善之心[N]. 学习时报, 2019-01-18(006).
- [26]马丽. 明末的劝善思想和慈善事业——以袁黄为中心的考察[D]. 苏州: 苏州大学, 2005.
- [27]王卫平, 马丽. 袁黄劝善思想与明清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J]. 安徽史学, 2006(5):39-50.
- [28]程伟. 《了凡四训》中的慈善思想[J]. 中国慈善家, 2017(Z1):92-93.
- [29]张丹. 《了凡四训》中的“善”与“过”[J].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4(11):151-152, 156.
- [30]刘坤. 浅谈《了凡四训》中的“改过”伦理思想[J].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4, 34(7):266-267.
- [31]潘志宏. 《了凡四训》的改过思想研究[J]. 新西部, 2018(20):82-86.
- [32]黄莹. 明末劝善书中的自省观——以《了凡四训》、《人谱》为中心[D].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2020.

- 
- [33]吴文新. 培育“绿色心根”亲近绿色生活——《了凡四训》“改过之法”的启示[J]. 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36(1): 33-38.
- [34]孙占同. 《了凡四训》的伦理思想研究[D]. 开封: 河南大学, 2012.
- [35]韩丽华. 《了凡四训》中的修身立德思想评析[J]. 人民长江, 2021, 52(2): 222-223.
- [36]徐立志. 《了凡四训》对于提高公民个人道德修养的启示[J]. 科技信息(科学教研), 2007(20): 456-457.
- [37]鲁克成, 宋卫. 《了凡四训》对提高大学生道德修养的启示[J]. 科教导刊(上旬刊), 2013(3): 86-88.
- [38]李秧. 《了凡四训》德福观研究[D]. 昆明: 云南大学, 2018.
- [39]丁洋洋. 道德传承与道德教育:《了凡四训》研究[D].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2018.
- [40]丁洋洋. 《了凡四训》中德育思想的时代体现[J].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7, 30(7): 72-73.
- [41]姚蓓, 桑明旭. 论《了凡四训》的“立命”观及其现实意义[J].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7(6): 71-75.
- [42]张世琼. 晚明善书文化中的德与命——以《了凡四训》与《迪吉录》为例[D]. 杭州: 浙江财经大学, 2013.
- [43]谷雨. 转变命运与致知力行的《了凡四训》[J]. 全国新书目, 2007(13): 12.
- [44]张丹. 《了凡四训》之立命之学[J].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7(12): 36-37.
- [45]姚晶晶. 简论“命由我定”的命运观——以《了凡四训》文本为例[J]. 科教导刊, 2012(6): 110+163.
- [46]胡超. 富兰克林的道德修善法与《了凡四训》的改变命运之法的比较研究[J].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7(5): 116-121.
- [47]李艳霞. 《了凡四训》浓缩的智慧[J]. 思维与智慧, 2017(3): 20-21.
- [48]韩星. 《了凡四训》立命之学解读[J]. 文史知识, 2020(08): 20-25.
- [49]李一. 价值辨识是传承弘扬优秀家训文化的必备前提——基于对《了凡四训》文本的简要评析[J].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20, 42(2): 92-98.
- [50]赵佳. 《了凡四训》中德育思想的时代价值探讨[J]. 文化学刊, 2019(11): 182-184.
- [51]李学昌:《了凡四训》对新时代大学生树立积极人生观的当代启示[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19, 32(21): 85-86, 91.
- [52]孙阳. 《了凡四训》对高职校生命教育的启示[J].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20(3): 61-63.

- 
- [53]吴文新,朱康有.《了凡四训》与共产党人的信仰自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 [54]李霞.《了凡四训》中的江南社会[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20.
- [55]王成涵.《了凡四训》中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内涵[J].大众文艺,2020(1):227-228.
- [56]钱翰.《了凡四训》的教育智慧[J].人民教育,2016(1):77-78.
- [57]李丽.《了凡四训》与家训文学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8.
- [58]曲静敏.明代家训《了凡四训》中的学前教育研究[J].汉字文化,2020(24):68-69.
- [59]郑姗姗,谢谦.晚明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以善书的讨论为中心[M].甘肃社会科学,2013(5):100-103.

#### 注释:

1 酒井忠夫著有《中国善书研究》一书,其中部分章节对袁黄的思想与善书进行了考察,他将袁黄的思想分为举业之学和以《立命篇》为代表的善书思想两个主要方面。

2 包葑雅著有《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一书,其书以袁黄及其家族为例,探讨了袁黄的家族传统、袁黄的思想及其转变、功过体系等内容,认为《了凡四训》中“立命之学”的核心内容是云谷禅师对功过体系的再阐释及袁了凡命运观的转变,而“改过之法”“积善之方”与“谦德之效”则体现了袁黄对儒家倡导的道德修养和佛教所主张的功德积累之间的关系。

3 游子安著有《善与人同——明清以来的慈善和教化》一书,其书立足整体,并以《了凡四训》为突出代表,研究了明清以来民间的慈善行为与社会道德教化的发展。